

雅安:云都和雨城

■林之光

4月20日,雅安芦山发生7.0级强烈地震。全国军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人们不禁会问,当地有什么样的特殊天气,对救灾会有些什么影响。

与东部地区相比,雅安地区确有特殊气候,例如冬暖夏凉,风小、日照少,而其中最特殊的,是本文要说的“云都”和“雨城”。

雅州天漏

雅安古称雅州,素有“雅州天漏”之说。即雅安这地方雨多,一下起来没完没了,像天漏了似的。因此又得名“雨城”。四川盆地著名的“清风雅雨建昌月”,其中的“雅雨”也是指雅安的多雨。

雅安的年平均雨量1774毫米,虽比同纬度1300-1400毫米左右要多,但在南方大致也只是中等偏上。例如“邻居”峨眉山就1923毫米,我国福建、两广沿海,海南岛东部和云南西南部等成片地区年雨量都大于2000毫米,台湾基隆以南的火烧寮6489毫米,西藏东南部巴昔卡4495毫米更是我国最多雨的地方。

因此,一般用雨量多来解释“雨城”似乎有些牵强。我从“天漏”说法得到启发,为什么不称“天塌”、“天裂”,而用温和的“天漏”?是否“雨城”强调的不是指雨量多而是指下雨的时间多呢?我查得雅安年平均雨日2180天,就已经把上述大多数多雨量地区比下去了。我在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了我国降雨(小时)数分布,虽然资料年代不太长。雅安年平均雨时2379小时(平均每个雨日下雨10小时36分之多)。全国除了峨眉山之外,极少有能超过它的。可见从下雨时间长来解释“雨城”可能更为合理。

雨日、雨时多对救灾工作是不利的,好在现在是当地干季,虽然仍3天中两天有雨,但一般只是中、小雨。

“雨城”问题中还应该提到夜雨。因为雅安

2013年4月22日,著名女作家程乃珊在上海病逝。被称为“上海女人”的程乃珊的代表作有:《上海Lady》、《上海女人》、《女儿经》、《金融家》等。

我的“班主任”程乃珊

■简平

程乃珊曾担任过上海惠民中学73届(5)班的班主任。我并没有在这所中学上过学,但我却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班主任”,她也同样把我看做是她的“班上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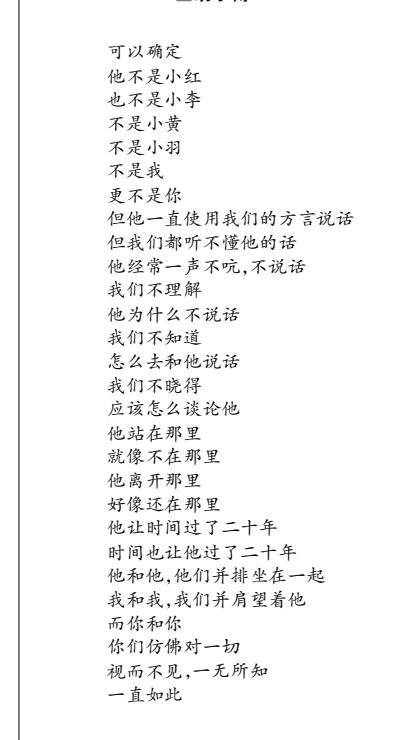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40多年前,我的一位比我高两届的技校学长,正是程乃珊的学生,他见我也是喜欢文学,便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去找我的班主任,让她教教你。于是,我便将我的习作由学长转交给程乃珊。没想到,她很快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让学长带给我。她很认真地看了我的习作,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她在信上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你来我家一趟,我直接跟你说。我跟着学长去了她当时位于静安寺的家,她是如此谦和与亲切,完全把我当成是“班上同学”,我也就认了这位“班主任”老师。

程乃珊把对我这个“班上同学”的帮助,全然看作是尽“班主任”的责任,她热心为我荐稿,使我可以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我的习作发表后,她高兴地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大半天,当她说“这真的比我自己发表文章还要开心”时,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程乃珊是否感受到我有多么地感谢她。

可以确定,一直如此

■胡子博

可以确定
他不是小红
也不是小李
不是小黄
不是小羽
不是我
更不是你
但他一直使用我们的方言说话
但我们都听不懂他的话
他经常一声不吭,不说话
我们不理解
他为什么不说话
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和他说话
我们不晓得
应该怎么谈论他
他站在那里
就像不在那里
他离开那里
好像还在那里
他让时间过了二十年
时间也让他过了二十年
他和他,他们并排坐在一起
我和我,我们并肩望着他
而你和你
你们仿佛对一切
视而不见,一无所知
一直如此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朱熹为什么要这么做

■钱文忠

我第一次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那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此后,这本残书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并随我漂洋过海到德国汉堡大学,一待就是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随便一个地摊都能买到。虽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石印本,但内容却完整无缺。3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阅读《大学》、《中庸》。

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指定教科书”。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是无法评估的。

《大学》、《中庸》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其中,《中庸》在汉代已经脱离了《礼记》,并且拥有了单行本,但《大学》就不一样了,直到司马光时代才开始出现单行本。当然,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

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

很多年之后,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而且继承二程(程颢、程颐),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大学》不仅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

那么,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当时的朱熹,面临着一个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一千多年来,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慢慢渗透到当时的文化之中,并且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其影响力直逼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朱熹自己本身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深深明白,仅仅依靠儒家所看重的“五经”,是绝对不能维持儒学的地位的。而且“五经”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方法论,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于是,朱熹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养和忧患意识,在《礼记》里找到了在本体论上有独到之处的《大学》,并且拥有了单行本,当然,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

名言。在《一九八四》的世界,党员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逃得过思想警察的眼睛。而拉金在书中描述一个缅甸人和他说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这个政权什么都知道。如果有醉汉发表反政府言论,地方市场有一篮芒果被偷,或夫妻间单纯的争吵,最可能知道这些事的就是军情人员。这种控制方法非常有效:老大哥真的无所不在。”讽刺的是,当年身为英国警察的奥威尔其实也负责类似的情报搜集工作,只是情况没这么极端。

在缅甸不同城镇住了五年后,奥威尔回到英国,选择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十年后他写下:“比寂寞或炎热更重要的一项基本事实是,这里的景色相当奇异。起初,这个异国的景色令他厌烦,而后令他憎恨,但最后他会逐渐喜爱上它,他的意识以及他的信念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景色不可思议的影响。”

五年的缅甸生活对奥威尔后来的写作理念起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不只来自那奇异瑰丽的热带风情,更在于他自身作为殖民体制的一环,尤其警察是压迫者的第一线,让他产生巨大的罪恶感,并反省到殖民主义的问题。他开始凝视底层人民、被压迫者,并且学着述说他们的故事。“码头上的犯人、死刑室等待行刑的男子、我欺凌过的下层民众以及老人、还有我在盛怒之下用木棍打过的仆役,他们的脸孔不断在我脑海中萦绕着。”

回到英国一年后,奥威尔就发表文章《一个国家如何被剥削:大英帝国在缅甸》,并进而关注英国本身的底层生活。几年后,奥威尔发表以缅甸生活经验为背景的小说《缅甸岁月》。十多年后,震惊世界的《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出版。这两本小说是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背景,批判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只是,1920年代就离开缅甸、并且死于1950年的奥威尔,可能没有想到这两本政治寓言小说,竟然成为20世纪后半叶缅甸政治的最佳描写。

有则笑话是说奥威尔不只为缅甸写了一部小说,而是三部:《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动物农庄》的缅甸文版被改编成当地场景,并被赋予更诗意的书名:《四条腿的革命》。一个缅甸人说,这本书很有缅甸风味,“因为他讲的是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而这种事在缅甸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另一个缅甸人说,他们没有必要读《一九八四》,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九八四》。

几年前,美国记者埃玛·拉金出版了一本书《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一方面寻找当年奥威尔的身影,探索他当年的缅甸生活如何影响后来他的写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对比《一九八四》、《动物农庄》和当今的缅甸政治。“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这是《一九八四》里面的

名言。在《一九八四》的世界,党员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逃得过思想警察的眼睛。而拉金在书中描述一个缅甸人和他说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这个政权什么都知道。如果有醉汉发表反政府言论,地方市场有一篮芒果被偷,或夫妻间单纯的争吵,最可能知道这些事的就是军情人员。这种控制方法非常有效:老大哥真的无所不在。”

在缅甸,拉金说,每一位作家都至少有一本本书遭到审查部查禁,因此可以说缅甸存在着一个未出版图书的秘密档案库——在作家脑子里不断徘徊的故事,与隐藏起来的完稿。一名缅甸作家开玩笑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我们只是没有公开发表的自由。”

这再次令人想起奥威尔所说,文学与极权主义是不可能共存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允许记录真实,只能仰赖谎言,但“文学如果不能真实地表达人们的想法与感受,它便一无是处”;“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一样,无法存活于兽栏之中”。

这两年缅甸政治出现巨大的变化:2011年上台的新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立法通过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昂山素季被释放并且可以被报道,甚至参选——她在4月1日的选举当选国会议员,首次真正进入政治。

在《一九八四》一开始,温斯顿·史密斯蜷缩在他公寓中狭窄的壁龛里,以躲开电视幕监视的范围。当他在日记第一页写下日期时,他想着自己要写给谁看,因为不管给谁看都是不安全的。但他还是在日记写下:“献给未来或献给过去,献给思想自由的时代,当人们彼此不同且不孤独生活——献给真实存在与已经记录就不会再被抹掉的时代。”

或许,这个未来的时代已经来到,缅甸的2012将不再是过去的《一九八四》。
(节选自《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张铁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乔治·奥威尔在缅甸

张铁志

接受桓玄的策反,不战而降,希望既可以借桓玄之手除掉司马元显,又可有朝一日乘机夺权。结果,桓玄顺利东下,攻入建康,诛杀司马元显。

不过,桓玄获胜以后非但没有加封刘牢之,反而解除了他的兵权,让他去做会稽太守。刘牢之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决定去广陵(今扬州一带)投奔他的女婿高雅之,在江北收兵对抗桓玄。他一面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接家眷过江,一面召集手下将官商讨。参军刘袭说,靠临阵倒戈终究难成大事,刘将军您往年反王恭,近日反司马,现在又要反桓玄。一人而三反,何以立足?话说完扬长而去,其余将官也大多作鸟兽散。

刘牢之感受到了众叛亲离、无力回天的悲凉,天下哪里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处呢?这时候,和儿子约定返回的时间到了,刘敬宣却迟迟未归。刘牢之想,一定是刘袭截杀了他,向桓玄邀功请赏去了,于是万念俱灰的他上吊自杀。刘牢之刚死,刘敬宣就赶了回来,见到父亲的尸首,来不及大哭,就连夜渡江,投奔高雅之去了。手下兵士将刘牢之装殓好,葬于丹徒。桓玄知道后,下令砍棺,将刘牢之斩首,暴尸于市。

历来人们都将刘牢之之死归罪于他自身的反复无常,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就曾嘲讽他“诈而愚”。这当然不能算错,不过终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刘牢之是本以伍出身,在士族门阀制度居统治地位的晋代,这一出身颇有尴尬之处:一方面他不具备尊贵显赫的社会地位,一方面他掌握军力又为门阀大族和朝中显贵所倚重。因此,他既被门阀政治所利用,又被士族权贵所轻慢。比如王恭,为了让他刘牢之为他效死力,屈尊与之拜为兄弟,可同时又只把他当成行阵武将,一直对他“礼之甚薄”,使得刘牢之时刻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失衡,并由此滋生出对显贵们的仇视。尤其是当他所执掌的军事实力举足轻重的时候,自然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产生更多的诉求,而当诉求的炽烈与现实的冰冷形成鲜明的反差时,他对门阀显贵的忠诚度便与日俱减。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牢之的“一人而三反”,是东晋末年新兴军事力量试图摆脱对门阀大族的政治依赖,从而寻求自身政治诉求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无奈选择。他的最终失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门阀政治,败于他在与门阀士族进行搏斗时的彷徨无措、进退失据。

不过,刘牢之虽然败了,以新兴军事力量为代表的士族阶层势力终归已经形成,并不断壮大。18年后,北府兵旧将刘裕终于代晋建宋,修成正果,而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门阀政治历史,也从此江河日下。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